

汉学更新运动研究

——清代学术新论

陈居渊 著



凤凰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05BZX039

汉学更新运动研究 ——清代学术新论

陈居渊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学更新运动研究 : 清代学术新论 / 陈居渊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506-1841-1

I. ①汉… II. ①陈… III. ①汉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K249.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9520号

- | | |
|-------|---|
| 书 名 | 汉学更新运动研究——清代学术新论 |
| 著 者 | 陈居渊 |
| 责任编辑 | 韩凤冉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211523 |
| 开 本 | 718×1005毫米 1/16 |
| 印 张 | 23.75 |
| 字 数 | 342千字 |
| 版 次 |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06-1841-1 |
| 定 价 | 58.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目 录

引 论

本书构画出一幅十八世纪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汉学”实态图景,并通过这幅图景比较客观和完整地揭示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那场由汉学精英自发的汉学更新运动。

第一节 “汉学”之名的说明·····	〇〇二
第二节 二十世纪“汉学”研究范式的回顾·····	〇〇六
第三节 新的研究视角及其宗旨·····	〇二三

第一章 汉学复兴的初始形态····· 〇三一

清代汉学复兴的动因,它的最初源头便是明清之际社集的经学活动。对于结社,以往学者从政治层面和文学层面解释的多,而对其学术的旨趣则少有认识。事实上,明清之际的社集并非完全专事议论时政或从事文学创作,而是以“尊经复古”为其学术宗旨。

第一节 经学信仰的转换·····	〇三二
第二节 宋元经注的回归·····	〇三八
第三节 汉唐经学的复萌·····	〇四四

第二章 汉学建构的地域渊源····· 〇六三

将十八世纪的汉学分派,始于近代章太炎。那么,“吴皖扬

汉学更新运动研究

〇〇二

常”分野说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可以概括十八世纪学术？从十八世纪的学人书札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并不具有严格的分派意识，更多的是对经典本义的反向回溯。从这意义上说，任何将十八世纪学术判定为“吴皖扬常”的分野，不符合十八世纪时期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

第一节 家学传承与汉学建构.....	〇六四
第二节 学人书札与汉学网络.....	〇七七
第三节 吴皖扬常汉学一体化.....	〇九三

第三章 汉学鼎盛的经学表征..... 一一四

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人的观察对十八世纪汉学的研究都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因此也都程度不等地烙有各自的政治倾向的痕迹。从总体上看，十八世纪汉学鼎盛时期的经学表征，主要体现在贯通家法与师法、倡导小学与明道、批评经学理学化、勤于考证与崇古等四个方面。

第一节 融通家法与师法.....	一一五
第二节 倡导小学与明道.....	一二七
第三节 批评经学理学化.....	一三四
第四节 勤于考证与崇古.....	一五二

第四章 汉学面临的两难困境..... 一七〇

十八世纪末，虽然经学著述如林，名家辈出，但是纯粹考证终使学术研究逐渐走入补苴缀拾的死胡同。汉学不但遭到当时尊宋学者如姚鼐、翁方纲、方东树等人的挑战，而且文人学士如章学诚、袁枚等对汉学也提出种种质疑，甚至在汉学家内部也出现了不满和检讨的声音，汉学的发展正面临着两难选择的困境。

第一节 宋学派对汉学的挑战.....	一七一
--------------------	-----

第二节 学术界对汉学的批评·····	一八二
第三节 汉学精英的自我反省·····	一八六

第五章 汉学的更新运动····· 二〇五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汉学更新运动,汉学家们颠覆了十八世纪以来的汉学偶像,为传统经学正名。确立儒学的正宗地位,突破了传统注经的旧模式,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学术导向呈现出汉宋融合的新态势,成为汉学在跨入近代转折点上的一次质变。

第一节 重新选择汉学偶像·····	二〇五
第二节 重新界定经学考据·····	二一六
第三节 重新诠释实事求是·····	二二三
第四节 重新理解汉宋学术·····	二三六

第六章 汉学研究的多元格局····· 二五八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汉学更新运动,不仅更新了经学理论,而且促成了汉学研究的多途取向。与十八世纪汉学家的经学研究相比,自有其新的特色与贡献。

第一节 编撰经典新疏的取向·····	二五八
第二节 研究典章制度的取向·····	二七〇
第三节 回归今文经学的取向·····	二八六
第四节 整合先秦诸子的取向·····	二九四
第五节 解读宋学经典的取向·····	三〇〇
第六节 评估王学价值的取向·····	三一—

第七章 历史影响与历史地位····· 三三五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汉学更新运动不仅打破了乾嘉以来经学官本位的传统,延续了汉学自身的学术生命,而且

也昭示了向近代经学形态蜕变的契机。不仅为其所置身其中的经学传统打下了新的烙印,而且也在中国经学史上留下独特的轨迹。

第一节 对晚清汉学研究的影响..... 三三五

第二节 对晚清学风的影响..... 三四七

第三节 汉学更新运动的历史评价..... 三五七

主要参考文献..... 三六六

后记..... 三七四

引 论

经学从汉代开始,历经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近二千余年的演变发展,先后呈现出神学化、玄学化、理学化、朴学化的时代特征。产生于十八世纪的“汉学”,就是中国古代经学朴学化时期的集中体现。本书构画出一幅十八世纪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汉学”实态图景,并通过这幅图景比较客观和完整地揭示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那场由汉学精英自发的汉学更新运动。

引
论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核心,不仅体现了古代人们所理解的“常道”“常理”,而且还被赋予所谓的“托事明义”的涵意。早在先秦时期的荀子,他就认为经学是“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的博大精深的圣人之学。现代学者马一浮也认为经学就是盈天地之间,聚万物之理,尽自心义理大全的“六艺之学”。因此,古代那些所谓“皓首穷经”的学者一直为世人所称颂,而那些所谓“离经叛道”的学者则将为人所抨击,经学在古代社会生活和学术领域中都具有最高权威的象征意义。

经学从汉代开始,历经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近二千余年的演变发展,先后呈现出神学化、玄学化、理学化、朴学化的时代特征。产生于十八世纪的“汉学”,就是中国古代经学朴学化时期的集中体现。汉学不但在中国古代经学史,而且在古代思想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二十世纪以来,对它的研究,不仅成果密集,而且名家辈出。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余英时以及侯外庐等学者的研究,现在已被学术界认同为一种研究范式。不过,对于十八世纪“汉学”的渊源、建构、分野、转

〇
〇
—

汉学更新运动研究

型等问题,至今仍然是见仁见智,有讨论而无定论,争议颇多。鉴于此,本书将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突破现有的种种研究范式,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互不沟通、互有界限的惯例。既注重汉学思想传承脉络的分析,但不以“政治史”为基本框架;也重视汉学复萌、鼎盛及其转型的社会史研究,但不以“思潮史”为描述对象,偏重于从家学与学人经学圈、经学专题与哲学诠释的角度^①,探索十八世纪汉学的建构与转型的演变轨迹与历史启示,由此构画出一幅十八世纪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汉学”实态图景,并通过这幅图景比较客观和完整地揭示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那场由汉学精英自发的汉学更新运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首篇中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运动”的理解,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的演变细分为:清初学术为“黎明运动”,清代中期的考证学为“群众化运动”,晚清学术为“今文经学运动”等。本书之所以取名“汉学更新运动”,非好大言而立异,亦踵梁氏之意,要在为读史考文之助而已。

第一节 “汉学”之名的说明

有关十八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特征,学术界一直存有多种不同的称谓,或“朴学”,或“考据学”,又或“汉学”。“朴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原指质朴之学,即汉代经学中的古文经学派。如《汉书·儒林传》:“(兒)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朴学”也被指代为经学。如苏辙在题为《和犹子迟赠孙志举》一诗中说:“我家六男子,朴学非时新。”又《宋史·杨大雅传》:“大雅朴学自信,无所阿附。”十八世纪学者崇尚汉代经

学,主张研究经学应该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他们详考历史文献、辨别传世经注真伪、校勘古籍版本谬误、恢复汉唐注疏,对经学本身少有理论性的阐述与发挥,文章朴实无华,因而被称作“朴学”。如洪亮吉说:“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处士顾炎武、阎徵君若璩首为之倡。”^②《清史稿·儒林传》载:“(阮元)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有关“朴学”的特性,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将它归纳为以下十项:

1. 凡立一义,必先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2. 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3.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4.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5. 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6. 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7. 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8. 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9. 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10. 文体贵朴实简絮,最忌言有枝叶。

以上十项几乎概括了“朴学”所有狭义与广义的内涵。从具体内容上看,前五项概述的是“狭义”的朴学特征,即做学问必须重视证据,反对主观臆说。后五项概述的是“广义”的朴学特征,即强调做学问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追求“窄而深”与朴实文风的能力与欲望。可以说,梁

启超对“朴学”的概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考据”，也称“考证”、“考核”、“考订”，是指对古代文献中的文字音义以及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进行考核辨证。“考据”一词，根据史书记载，大致出现在宋、金时期，此后历代都有使用。如《宋史·吕大防传》：“契丹通好八十余年，盟誓、聘使、礼币、仪式，皆无所考据，但患修书者迁延不早成耳。”《金史·张行信传》：“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纲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又《元史·历志》：“今衡、恂、守敬等所撰《历经》及谦《历议》故存，皆可考据，是用具著于篇。惟《万年历》不复传，而《庚午元历》虽未尝颁用，其为书犹在，因附著于后，使来者有考焉。”再《明史·乐韶凤传》：“未几，复起为祭酒。奉诏定皇太子与诸王往复书答礼，考据精详，屡被褒答。”这表明，“考据”实际上是研究历史、语言的一种手段与方法，并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将“考据”方法明确视为一种专门性的学问，则始于清代。如昭槁说：“本朝诸儒皆擅考据之学，如毛西河、顾炎武、朱竹垞诸公，实能洞彻经史，考定鸿博。其后任翼圣、江永、惠栋等，亦能祖述渊源，为后学津梁，不愧其名。”^③又如在现存清人所作的一些传记类著作中，经常出现诸如某君“博闻强识，精考据之学”之类的评价即是明证。

“汉学”之名，出自何时？至今学术界没有定说。章太炎在《与叶德辉书》中说：“焕彬先生足下：与足下同治古文，而执守往往异趣。仆言小学，以疏通中夏语言，本之《说文》。《说文》者，语言之纲纪，贯古今而范围之，不应标识汉学以自拘挛。汉学之名，本起明时七子，特以文辞异宋，假为斯号，及惠定宇，以是为说经准绳。是时，儒言庞杂，如百诗、拙明诸公，犹沾沾滞于俗论，定宇所以定一尊者，蔽遮澜言，固不得已也。时极势迁，其门下又守残不悟。东原、晓徵、怀祖诸公，追而正之。自兹以降，学者虽同名汉师义法，然皆假其训诂度制还以相攻，若所谓以矛刺盾者是也。”^④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一文中也辨析说：“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⑤其实，“汉学”之名古已有之，它专指汉代的象数《易》学。如

宋代学者刘克庄在总结汉魏时期的《易》学研究时就指认“汉学”专为象数《易》学。他认为：“京房、费直诸人，皆舍章句而谈阴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然其弊流而为虚矣。”同样，元代学者袁桷也说：“《易》学以辞象变占为主，得失可稽也。王辅嗣出，一切理喻，汉学几于绝息。”^⑥汉魏时期象数《易》学的消解，是否可以归结于王弼对于《易》学的重建，那是另外一个学术问题，这里姑且不作深论，但是刘、袁之说可证章、刘二说失考。

“汉学”泛指汉代的经学，那是在十八世纪经学家所提倡的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之后。如十八世纪以惠栋为代表的江苏吴地学者，或稍后的以戴震为代表的安徽皖地学者与江苏扬州籍学者的经学研究，他们都以“汉学”相号召而独树一帜。虽然当时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为汉学家立传，方东树作《汉学商兑》维护宋学尊严，从而掀起了汉宋学术之争的大浪。即便是如此，仍有学者未曾将汉学与宋学视为对峙的学术分野。如龚自珍不仅表示《国朝汉学师承记》不但有“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的瑕疵，而且还认为汉学实际是十八世纪的经学，所以他建议江藩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⑦。晚清学者皮锡瑞甚至认为十八世纪的汉学传承了宋学的传统，他在《南学会讲义》第七讲中说“汉学出自汉儒，人皆知之，汉学出自宋儒，人多不知”，这也成为后来钱穆提出清代学术事实上是从宋学转换而来的观点之滥觞。

由于“朴学”、“考据学”、“汉学”等名词虽异，但其涵义往往有其相通的一面，三者之间的学术指向并无明确的歧义，所以从清代起三名便一直混用，并且沿用至今，这在学术界中早已约定俗成。不过，如果从使用的频率来看，“汉学”无疑高于“朴学”与“考据学”。而“朴学”之名过于宽泛，它的学术指向比较模糊。“考据学”严格地说，它只是历来学者所普遍使用的一种整理历史文献的技能和方法。诚如江藩所说：“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所以“考据”之名，仍然不足以涵盖十八世纪的学术思想特征。考之清人著述，学者也每每以“汉学”自诩。如汪中之子汪喜孙在阅读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后总结说：

国朝汉学昌明，超轶前古。阎百诗（若璩）驳伪孔，梅定九

(文鼎)定历算,胡朏明(渭)辨《易》图,惠定宇(栋)述汉《易》,戴东原(震)集诸儒之大成,哀然著述,显于当代,颛门之学,于斯为盛。至若经史、词章、金石之学,贯穿勃穴,靡不通擅,则顾宁人(炎武)导之于前,钱晓徵(大昕)及先君子继之于后,可谓千古一时也^⑧。

这表明,“汉学”的内容,实际上综合了当时经学、史学、文学、历算学、金石学等多种专门之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梁启超曾将其形象地描述为“家家许郑,汉学如日中天”。胡适更是将“汉学”包容的范围确立为四个方面:一是文字学,二是训诂学,三是校勘学,四是考订学。前三者可视作“朴学”,后者即是所谓的“考据学”。同时,又考虑到晚清以来,学术界常常视“汉学”之名与“宋学”之名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如皮锡瑞在《南学会讲义》第七讲中便说:“汉学专门精到之处,自较宋儒所得更深,然觴源导自前人,岂宜昧所自出。则汉宋两家之交哄,夫亦可以解纷矣。”这表明“汉学”之名似乎更能体现出十八世纪的学术思想特征。有鉴于此,本篇叙述则采用“汉学”一名。不过,为了行文的方便,有时也间用“朴学”、“考据学”等称谓,并不完全限于“汉学”一词。

第二节 二十世纪“汉学”研究范式的回顾

对十八世纪“汉学”的研究,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堪称成果最为丰硕,理论观点可谓绚丽多彩。自二十世纪以来,章太炎的“文字狱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以及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等,它们作为研究汉学史的范式,在近百年的学界中影响深远。本节通过回顾与评述上述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探讨汉学史研究范式在二十世纪的转换与变迁,目的在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探索起点^⑨。

一、从“文字狱说”到“理学反动说”

将十八世纪汉学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清廷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始于

章太炎(1869—1936)。1902年因遭清廷通缉追捕而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在重订《诂书》时新增的《清儒》篇中指出:十八世纪的学术之所以由宋明理学转向汉代经学、考据学,它的主要动因是当时一般学者都深受清朝政府大兴文字狱的压迫,由于内心的恐惧,致使他们论学撰文不敢正面触及学术问题,为了避免由文字狱带来的迫害与学术上的禁忌,于是不得不转向考证一名一物的经典考证之学,这就是章太炎所说的“家有智能,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同时,章太炎又在《学隐》一文中再度阐明了自己这个基本观点:

处无望之世,炫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网罗周密,虞候迦互。执羽箭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扈,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邪?

正是根据这一“文字狱说”,章太炎将十八世纪汉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分为:清初汉学复萌、乾嘉考据学鼎盛、嘉道今文经学、晚清的调和汉宋等四个阶段。所谓“汉学复明”,是指清初顾炎武为汉学开山,阎若璩、张尔岐、胡渭等人继之,他们提倡汉学,堪称硕儒。他们的功绩在于开创新的学风,其本身的学术研究与理学乃有藕断丝连的联系。所谓“乾嘉考据学”,即为章太炎所确认的汉学自成系统的初始阶段。其标志便是吴地与皖地学者将汉学研究推向极盛,其代表人物是惠栋与戴震,其治学特色是“渊乎古训”与“缜密严殫”。所谓“嘉道今文经学”,是指与乾嘉古文经学立异,崛起于嘉道年间的今文经学,其代表人物是龚自珍与魏源,其治学特色是“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至于晚清的“汉宋调和”,其代表人物,章太炎仅指名陈澧。其实,早在乾嘉后期的阮元、焦循、凌廷堪等汉学精英对汉学的自我反省中已见端倪,他们的学术研究并不完全囿于汉学。这里我们颇能发现,章太炎对清代学术所分的四个阶段,实是由其表彰清代汉学传统为出发点的,而这个出发点正是基于他的政治上“反满”与学术上“尊汉”的双重立场。

章太炎“文字狱说”的提出,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动,特别是在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合

汉学更新运动研究

约》签订后,点燃了多数爱国知识分子救国保民、力挽神州陆沉的热情。反映在学界的则是倡导“国粹”。如1905年“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出版《国粹学报》,设立藏书楼,搜罗珍贵古籍,广征会友,刊印《国粹丛编》、《国粹丛书》,并拟建立国粹学堂等,从而在学界形成了一股较有影响的学术思潮。而此时的章太炎也正割掉辫子,公开与清廷决裂,投身反清活动。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正仇满论》就明确指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又如他在《序种姓》一文中,通过对古代姓氏演变的考察,阐述华夏民族的形成史与胡汉姓氏的同化史,藉此唤起种姓意识,大造排满兴汉的革命舆论,声称“上天以国粹付余”,慨然以弘扬中国“闳硕壮美之学”自任,提倡“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可以说,章太炎以“文字狱说”来解释清代汉学史,既有在当时民族危机中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也有他强烈的国粹意识。

不过,十八世纪的汉学与清代政治高压固然有关系,但学术的发展仍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未必单一受政治的支配。因此章太炎以“文字狱说”解释清代汉学,仅是提供了一种政治性的判断,因而是一种外缘性的研究。但是“文字狱说”作为二十世纪研究十八世纪汉学史的首出观点,却将汉学研究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并为稍后的梁启超(1873—1929)提出的“理学反动说”作了重要的铺垫。

1920年,即“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步入晚年的梁启超,此时一反以往那种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情怀,毅然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九年献身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其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广为士林所推重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前者是关于清代学术史的通论性诠释,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具体展开与专题论证。梁启超著名的“理学反动说”就是出自《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这一理论观点的主要见解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是一种经典考证运动,其特征是消除由宋代学者曲解圣人立教的本意而给儒学的原始经典带来误读与理解上的混乱。在梁启超看来,宋明理学的根本缺点就在于“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就学术本质而言,“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这种虚学所带来的直接弊端,便是“学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其反动安得不起?”^⑩四年后,即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从学术思潮的

角度,列举五种学术取向来论证他所提出的“理学反动说”: (一) 王学自身的反动; (二) 自然界探索的反动; (三) 西学输入之反动; (四) 讲学风气之反动; (五) 佛学反禅之反动。所谓“王学自身的反动”,是指明末刘宗周等人以“慎独”观念,对王阳明后学(王畿、罗汝芳、王艮)痛加针砭,提倡“舍空谈而趋实践”的新学风。所谓“自然界探索之反动”,是指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二书虽非儒学专著,但它一洗明人好空谈而不读书的恶习,显示了学者求实求真的精神。所谓“西学输入之反动”,是指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以及汤若望等人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开拓了当时学者的知识面和视野。所谓“讲学风气之反动”,是指明人对先秦古籍、宋元刻本的重视。如焦竑的《国史经籍志》,范钦创建的“天一阁”,毛晋、毛扆父子经营的“汲古阁”等,为当时扭转空疏的读书风气起了关键作用。至于“佛学反禅之反动”,则指晚明株宏、德清、智旭等反对禅宗末流的参话头,背公案,掉弄机锋,而提倡净土宗,以极平实的地方立定,从事极严肃的实践工夫。总之,这五种所谓的“反动”,也正是梁启超建构其“理学反动说”框架的主要内涵。

正是基于上述五种学术取向,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的发展进程分为:复宋之故,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等四个阶段。按照梁启超的这个四段划分,清代学术的发展顺序应该是:首先是打倒王学而恢复宋学,其次是反程朱理学而恢复汉唐经学的活力,再次是推倒东汉的古文经学的权威而恢复西汉的今文经学传统,最后是摒弃一切传注式的传统经学而恢复百家争鸣时代的先秦诸子学,这也就是梁启超将其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的诠释。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五种学术取向,还是复古的四个阶段,都体现了清代学术由形式到内容的反动,然而决定了由内容到形式的解放。依照梁启超这一反动—解放的模式,清初学术是对王学的反动,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便是汉学对宋学的反动,而晚清的今古文之争,则是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的反动,清末诸子学的复兴,又是诸子学对今文经学的反动。换言之,清代三百年学术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遵循由反动到解放,即经由启蒙、全盛、蜕分、衰

汉学更新运动研究

〇
一
〇

弱四个历程递相流转的学术演化史。

正如学者早已注意到的,此时的梁启超正倾注极大的热情研究佛学,而佛典所谓生、住、异、灭的流转也启迪了他藉此比附清代学术的发展。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指出: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①。

然而细加考察,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四段说却另有渊源。那就是作于1904年的《近世之学术》一书中所提出顺康、雍乾嘉、道咸、光绪为清代学术发展的“四期说”。就分期的性质而言,它当然比上述“四段说”模糊。就学术而言,梁启超所作的评价也不高。如他认为:“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学术最衰时代。”但是就上述理学反动的五种学术取向而言,却相对清晰。他曾认为:“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继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②这虽为一种描述性的比喻,却无疑为他在十六年后提出的反动—复古—解放的模式奠定了学术基础。

如果我们再加追究,更不难发现,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实由章太炎的“文字狱说”脱胎而来。论年辈,梁启超与章太炎相仿,但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起步,却在章太炎之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深受章太炎“文字狱说”的影响。如他在《近世之学术》一书中屡引“余杭章氏谓”,又如《清代学术概论》中也同样注意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清廷政治高压的关系:“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③这与章太炎的“文字狱说”如出一辙。

梁启超无疑是汲取了章太炎的学术观点,但是他所崇尚的却是汉代